



▲提高工資性收入是城鄉居民增收的核心支柱，而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則是提高工資性收入的根本保障。

經濟觀察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並將其作為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的核心抓手，標誌着中國居民增收工作從原則性引導轉向系統性、可操作性推進。

當前，中國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的「兩個同步」目標基本實現，不過仍存在着不少挑戰，而通過推動居民增收來提振內需已是迫在眉睫。結合中國發展階段特徵、政策導向及發達國家成熟經驗，預計「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或將圍繞就業支撐、收入管道拓寬、城鄉均衡賦能、分配機制優化、政策協同保障五大維度精準發力，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繼而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力。

五維度推進城鄉居民增收

一、築牢就業根基：以高質量就業支撐工資性收入增長

就當前居民收入結構而言，工資性收入可謂絕對的大頭，2024年居民工資性收入佔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達56.5%。從這個角度看，提高工資性收入無疑是城鄉居民增收的核心支柱，而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則是提高工資性收入的根本保障。後續增收計劃有必要將穩定和擴大高質量就業放在首要位置，聚焦重點群體與結構性矛盾，構建全方位就業支撐體系。

在重點群體就業保障方面，可以進一步實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大齡勞動者等群體的專項就業支持計劃。針對高校畢業生，要強化校企合作與見習基地建設，推動職業教育與市場需求精準對接，暢通互聯網、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就業管道；對於農民工群體，要擴大重點工程專案和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的以工代賑規模，提高勞務報酬發放佔比，同時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與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農民工城市就業成本。針對技術變革帶來的結構性失業風險，特別是人工智能對青年和傳統崗位勞動者的衝擊，要建立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把中職教育資源更多轉向在職培訓，重點開展數字技能、先進製造等領域的專項培訓，提升勞動者崗位適配能力。

在就業品質提升層面，可以發力健全最低工資標準動態調整機制，逐步提高最低工資佔社會平均工資的比重，縮小與國際社會的合理區間差距。同時，要繼續強化勞動者權益保護，加快推進拖欠賬款問題解決，壓實地方政府屬地責任，實現中小微企業賬款「應付快付、應付盡付」，保障勞動者勞動報酬及時足額兌現。借鑒德國經驗，通過完善集體協商制度，推動行業工資集體協商覆蓋更多中小微企業，形成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讓勞動者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二、拓寬增收管道：啟動財產性與經營性收入增長潛力

除去工資性收入，2024年中國居民財產性收入佔比僅8.3%，經營性收入佔比16.7%，均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後續增收計劃可以從啟動資本市場財富效應、盤活農村存量資產、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等方面發力，以此來拓寬城鄉居民多元增收管道。

在財產性收入提升方面，核心是穩定股市與樓市預期，打通中長期資金入市堵點。後續應加強資本市場戰略性力量儲備和穩市機制建設，推動商業保險資金、社保基金等中長期資金有序入市，強化央企國企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嚴厲打擊財務造假、違規減持等行為，提升資本市場穩定性與財富效應。同時，豐富個人投資

者可及的債券、普惠理財等產品品種，降低投資門檻，讓居民分享資本市場紅利。對於樓市，將繼續推進存量商品房收購用於保障性住房，通過財政貼息等方式優化居民按揭貸款償還條件，改善租金回報率，穩定居民住房資產價值。還可以考慮借鑒海外「農村居民財產信託制度」，探索農村土地經營權、住房財產權入股信託模式，讓農民穩定獲得財產性分紅。

在經營性收入培育方面，應重點支持中小微企業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對中小微企業實施結構性減稅降費與信貸支持，要鼓勵金融機構優化經營性貸款期限與利率設置，開展續貸業務，緩解企業資金周轉壓力。在農村地區，將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實施農業品牌精品培育與「三品一標」行動，提升農產品附加值；因地制宜發展庭院經濟、林下經濟、民宿經濟等新業態，落實農機報廢更新補貼，強化產業聯農帶農機制，讓農民在產業鏈延伸中獲得更多收益。

三、聚焦城鄉均衡：強化農村增收與公共服務均等化

城鄉收入差距是中國收入分配的核心矛盾之一，後續增收計劃應把農村居民增收作為重中之重，通過產業賦能、要素啟動、公共服務補短板，推動城鄉收入差距持續縮小。

在農村產業增收方面，可以借鑒日本「造村運動」經驗，推動城市產業向農村梯度轉移，在縣城建設特色產業園區，讓農民實現「家門口就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物流、通信、旅遊公路等配套設施，支撐農村電商、鄉村旅遊等新業態發展。實施農村低收入人口提能增收行動，通過技能培訓、產業幫扶方式，提升低收入群體自我發展能力。同時，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讓農村土地資源轉化為農民增收資本。

在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應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推動教育、醫療、養老等優質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中央預算內投資將重點支持農村教育醫療、養老託育等領域專案建設，補齊公共服務短板。借鑒OECD國家經驗，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縮小城鄉公共服務差距，降低農村居民民生支出負擔，間接提升可支配收入水準。建立農村養老待遇動態調整機制，提高農村基礎養老金標準，完善農村醫保報銷政策，減輕農村居民醫療支出壓力。研究建立農村育兒補貼制度，降低生育養育成本。

四、優化分配調節：發揮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協同效應

中國再分配調節功能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後續增收計劃應通過稅制改革、社會保障升級、轉移支付優化，構建「調高、擴中、托低」的分配調節體系，同時引導第三次分配發揮補

充作用。

在稅制改革方面，應提高直接稅比重，優化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徵管模式，擴大綜合所得徵收範圍，健全專項附加扣除制度，減輕中等收入群體稅負。借鑒美國「勞動所得稅收抵免」（EITC）與英國提高個稅免徵額的經驗，對有工作的低收入者實施稅收返還補貼，以此來帶動消費與增收提升。探索與數字經濟相匹配的稅收治理機制，加強對平台經濟、高收入群體的稅收監管，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推進財產稅改革，擴大房產稅試點，發揮財產稅對財富分配的調節作用。

在社會保障與轉移支付方面，應完善社會保障全國統籌制度，提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統籌層次，增強社會保障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繼續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與醫保補助標準，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實現應保盡保。優化轉移支付結構，加大對欠發達地區、農村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重點支持民生領域與增收相關的專案建設。借鑒OECD國家經驗，強化轉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通過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組合拳發力，縮小不同群體收入差距。

五、強化政策協同：構建增收長效保障機制

需要指出的是，城鄉居民增收是系統性工程，需要財稅、金融、產業、投資等政策協同發力，構建長效保障機制，才能確保增收計劃見效。

在政策協同聯動方面，需要進一步健全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機制，推動消費政策與財稅、金融政策同向發力。財政政策要發揮引導帶動作用，通過補貼、貸款貼息等工具，重點支持消費領域與增收相關的專案。金融政策應加大對增收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鼓勵金融機構擴大個人消費貸款與經營性貸款投放。產業政策須聚焦高質量發展，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現代服務業，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與增收機會。

在投資與消費良性互促方面，應統籌投資與消費關係，擴大消費基礎設施、服務功能提升類專案的有效投資。支持消費、文旅等領域專案發行REITs，盤活存量資產，形成「投資支撐消費升級、消費率引投資擴容」的良性循環。

結語

總而言之，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是應對全球經濟變局、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舉措。後續發力要以高質量就業為根基，以多元增收管道為支撐，以城鄉均衡為重點，以分配調節為保障，以政策協同為紐帶，破解增收領域的突出矛盾與堵點問題。

（作者為星圖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因地制宜 提高居民消費率

如何提高居民消費率？對於2026年

「促消費」路徑，「讓老百姓能消費、敢消費、樂消費」這一指標具有重要政策引導意義。服務消費的探索並非一蹴而就，全國「一刀切」的方式也不一定可行，須結合各地資源稟賦和發展特色，鼓勵部分有條件的地方「先行先試」，待形成有效經驗再向全國推廣。

中國消費發展並不均衡，表現出明顯的「四類形象」。根據各省人均消費率及人均養老支配收入表現考察，可發現各省消費率內部水準不一定與經濟發展相一致。具體而言，可歸納為四種消費範式：樂於消費型（收入偏高、消費率偏高的省市，如廣東、浙江等）；（2）敢於消費型（收入偏低、而消費率偏高的省市，如四川、海南、黑龍江等）；（3）警惕於消費型（收入偏低、消費率也低偏的省市，如西藏、陝西）；（4）慎於消費型（收入偏高、但消費率偏低的省市，如上海、北京、江蘇等）。

廣東、浙江兼具「經濟大省」與「樂於消費型」省份的雙重特徵，近年來兩省全面鋪開的城鎮化模式，既讓全省居民更加均衡地享受到發展紅利，也帶動外地遊客的消費向全省範圍擴散。

同時，「樂於消費型」省份的人均公園綠地面積表現突出，能直接轉化為居民日常生活中可消耗的宜居環境。當然，「樂於消費型」省份積極主動地「廣納賢才」，為經濟發展注入活力，也顯著提振消費。例如，廣州的高校在校生規模全國第一，深圳、廣州、杭州的人才吸引力也穩居全國前五。同時還關注從「吸引人才」到「留住人才」的閉環建設。更重要的是，從常住人口淨流入型趨勢來看，「樂於消費」省份在「留住人才」方面表現同樣出色。

「敢於消費型」省份財政支出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仍堅持以最大力度「投資於人」。這些省份的城鄉收入差距普遍小，相對均衡的收入分配結構增強了中低收入群體的支付能力和消費意願，使消費增長更可持續。

「怯於消費型」省份目前正處於經濟爬坡階段，消費發展容易設定於地方財力與居民收入的雙重約束。居民面臨支付能力設定、消費信心不足的困境，容易陷入低消費與低增長相互抵銷的迴圈。省份「投資於人」的力度相對更弱。

「慎於消費型」省市是四類消費格局中複雜的一類，其「促進消費」路

徑表面上面臨矛盾，實則暗藏變聲的突破路徑。這些省份城市普遍表現出「高收入≠高消費」的暴露反差，北京、上海等地的矛盾典型，居民意願強、消費釋放不足，構成了當前擴大內需中一個值得深入破解的「高收入悖論」。

值得注意的是，「慎於消費型」省市消費動能的相對不足，與其自身的經濟結構選擇也密切相關。這些省市主要呈現出「重工業、輕消費」的發展特徵，政策資源配置更多向工業領域傾斜。這種結構選擇在特定階段支撐了經濟的高增長，但也相對否定了消費市場的豐富性和吸引力。

由於優先承擔了「挑大樑」的工業與科技發展任務，「慎於消費型」省市對本地生活性服務業的投入相對有限，導致其住宿和餐飲業增加值明顯偏低。高企的房價與生活成本更成為「慎於消費型」省市居民的「重擔」。

促消費政策不宜一刀切

「促進消費」政策不宜採用「一刀切」模式，需「對症下藥」：

樂於消費型：擔當服務業消費升級的「先行軍」。此類省市消費基礎好、人口吸引力強，通過打造高品質、全民的服務消費模式，重點布局文旅、康養、文體融合等新興服務領域，為全國形成可複製的升級經驗。

敢於消費型：重在夯實「能消費」基礎，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提升提質。政策重點應增強其在民生、成本控制等方面的優勢，進一步優化商品和服務供給品質。

警惕消費型：着力提升「消費能力」，適當加大對「投資於人」的重視程度。對於「警惕於消費型」地區，可以對標經濟相似的「敢於消費型」、更多向增強居民購買力、減輕負擔的「消費能力」入手。加大財政支出中投向民生的比例，同時將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與特色產業增速相結合，有利於優先保障基本民生、促進就業增收，切實增強居民負擔，夯實可持續的消費能力基礎。

慎於消費型：核心在於「降成本、補短板」政策。應着眼於將居民高收入切實轉化為可支配購買力。關鍵在於控制宜住房等剛性成本，確實居民支出壓力，使收入優勢真正「可感可及」。同時，這些省市也要培育高收入型生活服務業的經濟基礎，可通過增加託育供給、優化公共綠化和社區服務等方式，系統提升當地的生活居住性與吸引力。

（作者為國聯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利率下降 釋放樓市購買力

2025年本港樓市可謂有不少驚喜。

當中以減息最受矚目，息口向下，樓價成功止跌回穩。

美國自2022年展開加息周期，聯儲局共加息11次，累計5.25厘；本港最優惠利率（P）亦五次上調，累計加幅0.875厘。高息衝擊下，本港樓市首當其衝，二手市場蝕讓個案激增，新盤定價一浪低於一浪，整體樓價由2021年高位回落，跌幅一度接近三成。

加息陰霾籠罩樓市約兩年半，直至去年9月美國突然一次過減息半厘，力度較市場預期高出一倍，為全球金融市場帶來驚喜。其後在2024至2025年的港美減息周期中，美國合共六度減息，累計1.75厘。港銀五度下調最優惠利率，累減0.875厘。至此，本港P息已回落至加息周期前水平，意味「息魔」全面撤退。

今年樓市的另一驚喜，則來自政府再度出招。2月財政預算案將100元物業交易印花稅的適用門檻，由300萬元擴展至400萬元後，市場交投迅速回暖，尤以細價樓表現最為突出。發展商

亦把握時機積極推盤，今年以來已有逾40個新盤以價單或招標形式登場，一手市場氣氛熾熱。

下半年本港銀行再度跟隨美國兩次減息，為樓市添上助燃劑。一手成交連續11個月突破千宗，僅1月因農曆新年及傳統淡季影響，成交回落至約760宗，其餘月份均超過1100宗，其中3月更錄得逾2420宗，成為全年高峰。全年一手成交勢突破2萬宗，創下2013年一手住宅銷售新例實施以來的新高。

供樓成本降 資金重新流入

筆者認為，減息對樓市最直接的影響，在於顯著降低供樓成本。息魔撤退後，資金有望重新流入樓市，推動住宅市場價量齊升。今年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錄得逾5%升幅，終止連跌3年頹勢。市場預期明年仍具減息空間，供樓負擔有望持續減輕，購買力將逐步釋放，發展商積極重啟推盤步伐。媒體統計，明年至少40新盤推出，涉3萬伙。業界對後市轉趨樂觀，發展商未必再以「平價取勝」作為推盤策略，或轉為「價量兼備」。（作者為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港銀最優惠利率與美息走勢

